

中文和合譯本聖經

1919 年出版的中文和合譯本聖經，無疑的，是神給華人教會的特別恩賜，藉西方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合作的成果。聖靈印證神生命的道，使許多人得救。

自從 1807 年，更正教英國倫敦會宣教士馬禮遜（Robert Morrison, 1782-1834）來華，並即開始翻譯聖經。以後，相繼來的宣教士，也繼續分別譯經。至十九世紀末，已經有二十七種中文譯本，還有方言譯本的全部或部分聖經七十餘種，顯然對於信徒的交通和教導極為不便。

1890 年，在華各宗派和合協作，組成譯經委員會，推選委員七人，狄考文 (Calvin W. Mateer, D.D., LL.D., 1836-1908) 為主席，進行譯經工作。至 1907 年，新約譯竣，舊約只譯了詩篇，功尚未成，狄考文即離世。

在中國近代的文化教育發展上，狄考文是最重要的催化者之一。

他是最先介紹西方教育制度給中國的。受美國長老會的差遣，1863 年(同治二年)抵山東。先創辦文會小學，進而中學，於 1884 年，發展為成大學，名為“文會館”。狄考文為首任館主(校長)。

狄考文博學多能，精通數理化及工藝。在語文方面，著有官話課本，更著有物理，天文，化學，三角，幾何，代數等課本，是由各課程授課的講義修編而成。後來商務印書館編印課本時，採為張本。1898 年，清政府設立京師大學堂，由當時外務部同文館的丁韋良(William A.P. Martin)為總教習，徵請文會館畢業生八人任教習，是為北京大學的前身。由此可見狄及文會館於中國文教的關鍵地位。

富善(Chauncey Goodrich, L.H.D.,Litt.D.,1836-1925) 繼任主席，領導完成了新舊約全書的翻譯工作，於 1919 年出版問世。

富善是美國公理會的宣教士。他在北京工作，繼往通州，擔任華北學院及通州道學院的教授兼教務長。他對中文和北京官話研究深湛，曾編著《中英袖珍字典》及《官話特性研究》等書，是在華西教士和外交人員必備的參考書。他還通曉音韻，了解中文的詩曲詞賦，能讀能寫，造詣高深。此外，他也懂蒙古文，譯過單行本福音書。

譯經委員會的成員共有七人，來自不同的宗派，在中國不同的地區工作。除了狄考文和富善之外，先後有十四人參與工作；因為有人因教會事工忙碌中途退出，有的退休，又有的逝世，就由另外的人補入。但他們都是一時之選，絕不是濫竽充數。如：白漢理(Henry Blodget)，楊格非(Griffith John)，文書田(George Owen)，海格思(John Reside Hykes)，伍茲(Henry M.Woods)，鮑康寧(Federick William Baller)，仲鈞安(Alfred G. Jones)，及鹿依士(Spencer Lewis) 等人，無一不是精通聖經原文，而真正通曉中文。譯經工作歷時二十八年，到 1918 年才正式完成。在 1919 年出版時，原來的譯經委員，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見這本中文和合譯本聖經的問世，他也已是八十二歲的高齡了。

當時譯經的困難，超過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。那時，還沒聽說有拼音這回事，更沒有所謂國語；除了《康熙字典》之外，沒有方便輯成的詞書如辭源，辭海可查，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，聖經中有關農事農具的用語，則要查日用莊稼雜字之類的僻雜小書。這當然不容易而缺乏標準。在此之外，就得問來自中國各地的助手們。

這本卓越的聖經出版以後，深受教會歡迎。當時，中國正在推行白話文，適時的成為範本。

無論如何，因為當時客觀環境的困難，所譯的聖經，並不能完全達到“國語”化的標準；實際上絕對的標準並不存在，也沒有必要，所以還是稱之為普通話較為恰當。一般說來，和合譯本聖經裡面，有些區域性的語詞，對非北方人較難理解。不過，這類的方言，在聖經中並不多。